

胡明 著

· 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

HUSHI SIXIANG YU ZHONGGUO WENHUA

胡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胡明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8

ISBN7-5633-5449-2

I. 胡… II. 胡… III. 胡适(1891~1962) — 学术思想 — 文集 IV. B2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66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 271000)

开本: 635mm × 965mm 1/16

印张: 26.25 字数: 31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8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这本书是我近些年来研究有关胡适思想文化的文章的结集。“思想文化”在书名中被拆成两节——“胡适思想”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很好理解，无须多说；而“胡适思想”的解题需要费些笔墨。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千军万马，口诛笔伐，几千万文字进入历史档案，但对“胡适思想”的诠释仍没有多少头绪与条理。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批倒胡适就必须批臭其“思想”，否定胡适就意味着把“胡适思想”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胡适”与他的“思想”正是相联一体、血肉不分的。

在现代中国，以个人姓名冠名且得到严肃的思想界、学术界公认的“思想”罕有，“毛泽东思想”和“胡适思想”或许是最有名的两例。胡适认为他的历史存在与哲学是非全由于他的“思想”，他也常说除去“思想”，什么是“我”？剥夺了、剔除了其“思想”的独立哲学含义，也就不存在“胡适”，“胡适”这个名字也就毫无意义。胡适之所以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胡适”，就是由于他的“思想”的活力与光辉，胡适正是依赖着他的“思想”而存活、而有价值，并产生影响，进入文化历史。因此，胡适一生也最看重他的“思想”。胡适研究整理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理学史、中国禅宗史，他从批判孔孟、弹劾程朱到发现戴震、奖掖吴虞，从介绍实验主义到引导自由主义，从提倡“不朽”到打倒“名教”，无一不是着眼在“思想”上。他深深觉得他生活着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独立的思想，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要求青年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在给北京

大学的毕业生纪念赠言中引用过一个禅宗和尚的名言,“达摩东来,只是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而“我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真正有了思想,才能做到不受人惑,不被别人牵了鼻子,才能做到独立思考、自由选择。他常常说“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他主张我们宁可宽恕政治上的敌人,但不可纵容这个“不思想”的敌人。他甚至宣言一个人只要肯独立思考,便是他的同志。然而在中国社会包括知识界“不思想”的人毕竟众多,甘心被人牵鼻子的大有人在。所谓的“思想界”则更是懒人一堆,糊涂人一堆,头脑混乱的人一堆,这是最令胡适感到悲哀的。他曾在《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中悲叹:“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可见胡适对真正的“思想”要求又是很高的。但我们似乎又不能把“胡适思想”从与“中国文化”的粘合一团中清晰地剥离出来,孤立地悬置起来,本书中所收文章展示的正是“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特定联系和内在统一。至于“胡适思想”本身的哲学学理的探索寻绎或者条分缕析,则可参阅本书“附录”中的《论胡适思想的奠基》一文。尽管“胡适思想”孕育成熟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但它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内核仍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找到其一脉相承的合理因素。

前几年我在编选《胡适精品集》时曾在“主编的话”中将“胡适思想”的精神主旨大抵归纳为三条:

一条是积极开放的,既保持民族性,又充分世界化的文化立场。

一条是实事求是、服从证验、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相信任何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的思想方法。

一条是不苟且、不媚俗、独立的、审慎而负责任的言论态度。

原先归纳为四条,第四条是坚持民主自由、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渐进、奉行和平守法的宪政精神。——因为受到许多同行朋友

的善意劝告和出版方面的硬性建议而删去了,现在补在这里。加上这第四条,或许显得更完整、更圆通。而且这第四条也是海外关心胡适研究的同行朋友们很为看重的。——这四条的内核则是科学理性,它的旗帜或许便可称为“自由主义”。

说到海外的胡适研究,不由会想到它的“冷”,它的“冷”与中国大陆这十多年来的“胡适热”恰成鲜明的对照。从“胡适”论题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演变来看,海外的“冷”正说明海外已经走过了“胡适”的历史阶段与实验形态,即便说是“批判”的声音,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评论》派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新儒家的热闹之后,也已沉寂了下来。(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对胡适文化哲学中内在学理的挑剔,以及宏观上对胡适“西化”主张与自由主义的指责,甚至是胡适与“五四”对中国政治历史发展脉络的负面影响的反思!)今天,在海外胡适或许已走进了历史,胡适研究和批判也已是上一个时代的学术关注,“胡适”的话题大部分已经终结,胡适的“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胡适思想”大部分已经化作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常识与习惯,台北的“胡适纪念馆”当然也不能不门可罗雀。但是,“胡适”在大陆仍还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他的“任务”远未完成,他的大部分主张与意见(从思想哲学的改造到文化政治的重建)均未实现。——他的“热”正说明他的“问题”的特定含义在今天仍有无穷的魅力,仍启人深思,胡适在人们思维与信仰的世界仍有十分宽阔的活动空间。哪天大陆胡适也不“热”了,那我们或许已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迈入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但今天大陆的“热”也还应该传导到海外,海外可以反思的是他们是否真的已经全部解决了胡适提出过的“问题”?胡适走了四十年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做了些什么?又准备做些什么?

还是在那篇“主编的话”里我曾说,胡适的“学术意见与思想遗产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持续着特定的历史生命力”,又说他是“现代中国最具声望同时又争议最大的文化宗师

与思想巨人”。胡适的“特定的历史生命力”的“持续”正是由于他的“最具声望”又“争议最大”，这些“争议”的东西便是我们今天在思想文化的新建设中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迫切需要弄明白、找到答案的。——他的“声望”则保证了他的认知结构的完整、意义的延伸和思想的增值。

胡适当年号召研究的“问题”是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有些仍是我们今天需要圆满解决的问题；胡适当年带头输入的“学理”是当时急需启蒙并广泛传播的学理，其合理内核，特别是它的真理观与方法论至今仍拥有理性逻辑的巨大力量；胡适当年提倡的“整理国故”虽然今天已经硕果累累，但朝野公认胡适当年设计并期盼的“再造文明”却不曾实现，而且在如何“再造”的方法、途径的选择上仍是众声喧哗，各有主张。清议争执过了度，有时还酿成政治上的冲突。“再造文明”在胡适“五四”时代的蓝图里无疑包括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文艺复兴的战略目标。胡适逝世已40年了，但他的牌号的自由主义尚未找到传人，梁实秋所谓“但恨不见替人”。——从传人、替人必须扛大旗的历史要求来看，从思想醇度、学养厚度、胸襟识力的博雅广大、品格操行的表里澄澈来甄别判断，可以说是“后不见来者”，“胡适”之“道”也可以说是“及身而绝”，尽管纸面上的群贤毕至、言论纷纷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胡适理想中的“文艺复兴”无疑是文化建设的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光芒万丈，功埒汉唐，但由于胡适的原创精神、设计主旨和文化思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析和协调，奠基后即多头开工，旗号林立，它的“竣工”似乎遥遥无期。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很愿意我的这本论文集能在思想文化这个范畴里为“胡适”再做一点诠释与疏解，再做一点论证与发挥，使得我们更能看清历史走过来的轨迹，看清胡适思想的功绩，看清在前行的大路上我们自己努力的方向。

2002年2月24日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	---

一 哲学篇

试论“五四”时期胡适在哲学思想界的影响	3
“无后”与“不朽”	
——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	18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察和文化理解	35
论胡适的科学人生观	57
关于胡适的无神论思想	73
胡适“名教”批判	86
胡适与《淮南王书》	97
理学运动与思想别裁	
——朱熹·戴震·胡适	110
关于胡适中西文化观的评价	122

二 文学篇

胡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兼谈胡适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倾向	147
胡适与“新红学”	163

“新诗老祖宗”	186
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	208
胡适“整理国故”的现代评价	227

三 文化教育篇

论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247
关于胡适的《水经注》研究	266
“胡适批判”的回顾与诠释	290
胡适关于大学教育设计述略	
——从《非留学篇》到《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323
试论胡适的经济观	
——从司马迁的“资本主义”、王莽的“社会主义”到	
海耶克的“自由主义”	338
关于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	350

附 录

《胡适传论》自序	363
《胡适诗存》前言	371
胡适留学时期的求学之路	378
论“胡适思想”的奠基	393

一 哲学篇

试论“五四”时期胡适在哲学思想界的影响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陈出新开创风气的又一个重大动作,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这部书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主干,以北京大学开课的讲义增扩整理而成。1918年7月交的稿,蔡元培为之作序并推荐到商务印书馆。胡适在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地位,具体是以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就与影响为标志——不仅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的首肯与赞赏,很快便也得到全国学术文化界的承认与钦佩。——这是胡适在中国文化学术坛站稳脚跟进而“成佛作祖”、呼风唤雨的基石。

在白话文运动取得巨大胜利之时,胡适就清醒地知道,要在中国上层文化学术界谋得声望与影响决不是靠倡导一个白话文运动所能办到的,上层学术文化界的芸芸耆旧、传统国学的老权威们反认为胡适“以白话藏拙”,只能靠通俗文化上的创新来自遮其短,这就关系到胡适能否在中国正统的学术坛站住脚跟的问题。本来蔡元培将胡适引上北京大学的讲台也主要看重的是他的学术与新知,而他想要在中国正统学术坛取得真正的地位和领导权也必须靠学术,尤其是在国学上的出色表现,这也正是当时北京大学以及国中文化学术领域的各色新旧人物拭目以待的。在国学的领域里,近三百年来,尤其是在乾嘉学风熏染下,考据、辨伪的真功夫铸就了一大批令胡适心悦诚服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戴东原、阎若璩、段玉

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崔东壁、章实斋、孙诒让……胡适自己的秉赋才性恰恰也使他一开始便是由考据、辨伪的真功夫走上学问之路的。胡适考上留美官费主要靠的是那篇“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考证文字,而这个关键的胜利又反过来刺激他一生走上了以考据为主体的治学道路。胡适留美期间写成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正是他考据治学的奠基之作,这些作品已经流露出向国中国学旧权威挑战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他善学殚思的读书习惯,精审缜密的逻辑训练,“不疑处有疑”的怀疑精神和“行文颇大胆、苦思欲到底”的现代治学态度——尤其是这一切又经过了留美七年西学新知的陶冶与融合,使他一开始走上这条大路便境界大开。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出版无疑是胡适踏上这条治学大路的第一块成功丰碑,在这部著作的“导言”中胡适以赫胥黎的怀疑论与杜威的实验术为理论的经纬,结合当时西方哲学、历史学、逻辑学、校勘学的方法论对以清代乾嘉考据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作了一次有系统的整理,他正是以这个系统整理后的,或者说中西学结合成的新方法、新眼光、新手段对待我们 3000 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遗产,终于理出了一个清晰简明的头绪来。这恰恰正是蔡元培所希望的“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蔡元培一直为摸不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门径”而苦恼,而编纂中国哲学史的“两层难处”又使国中无数有志者望而却步或避而绕路。蔡元培在他写的序中说:“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史的本没有几

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稟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① 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可见蔡元培对这一册《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是何等的钦佩与赞赏了。他又“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又可见其寄望之深、企盼之切。

蔡元培在“序”中总结了这部书的四大特点。一、证明的方法。即考实每一哲学家生存的年代以探知他的思想的渊源,辨别他著作的真伪以把握原本的主义,揭示他们采用的哲学方法而检讨其论辩有无矛盾抵牾之处。二、扼要的手段。即所谓“截断众流”的大手法,一部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把夏商和周的一半一刀砍去,用存疑的态度处理了迹近神话传说的甚不可信的某些史料。三、平等的眼光。对先秦诸子不作先验的褒扬与贬抑,推倒尊经崇儒的旧传统。一个个还他们本来的历史面目,平等地、科学地研究他们学说的长处与短处。四、系统的研究。排比时代,比较论旨,一一显示各家师承渊源及其变迁的痕迹,勾勒出一条思想史递次演进的脉络。——蔡元培对此四大特长推崇备至,赞叹其目光深远,手段高明,“一样样都是超越古人,开出风气的”。稍后他在那封著名的答复林琴南的长函里又说到:“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难怪他要迫不及待地将此书推荐到商务印书馆,而结果却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大出意外地赚了一大笔钱。

① “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稟有汉学的遗传性”云云是蔡元培的误识。胡适自幼进的是宗族内的旧式私塾,他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梅溪学堂时已经14岁了。

蔡元培的“序”勾画出的这四大特长中后世人特别推崇,尤其是从思想史意义上特别推崇其第二与第三条。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一是从老、孔讲起,一是将孔子与诸子平列。正是这两点从思想上,而不一定在学术上,对当时起了震撼的作用。纯从学术讲,老、孔前的思想包括周公‘制礼作乐’的研究考证(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便仍然重要,但从思想上,甩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却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①当年胡适教过的哲学系的学生,后来在哲学史研究上,尤其是孔、老先后及其地位等问题上与乃师胡适意见相左的冯友兰先生^②也十分赞叹“截断众流的”第二条:“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三松堂自序》)。当代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名学者任继愈则从思想史贡献上推崇其孔子与诸子平列的“平等的眼光”。他在《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三十年》一文中说:“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不准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只能膜拜,不能非议,这是封建社会的总规矩(西方中世纪对《圣经》也是如此)。据当时人的印象,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

① 胡适对孔、老之前的文物制度、文明史实的实际认识并不是武断的。1921年胡适在给他的得意学生——“古史辨派”中坚骨干顾颉刚的信中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②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孔子开始讲起,到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他认为《老子》一书系战国时人所作。哲学史从孔子讲起更因为“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唯一师表”。为之胡适曾在1958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特别就冯友兰这一层学术认知做了一段批驳文字。

一新……‘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

当然胡适对非儒各学派采取“平等的眼光”还着眼于“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先秦名学史》)。——因此对于信奉实验主义,尤其是其科学方法论的胡适本人来说,似乎更看重第一与第四两条。第一条“证明的方法”,胡适所谓“名学的方法”。蔡元培曾誉之为“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第四条“系统的研究”,胡适所谓“祖孙的研究法”。胡适在全书的“导言”之后的第一章之第一段正文阐扬的即是这个研究法:

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下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譬如一篇文章,那种学说不过是中间的一段。这一段定不是来无踪影去无痕迹的,定然有个承上起下、承前接后的关系。要不懂得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得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

关于这两条特长,胡适在40年后还特别作了强调。

《中国哲学史大纲》除了思想内容上这四大特长之外,他的形式特长亦有特别的开风气的重大意义。首先是与他的白话文倡导相呼应,全书采用白话文和与之相适应的新式标点符号,显示了白话形式的能动作用——它不仅能做诗著文,是新文艺的锐利武器,还能从事纯粹意义的国学研究。胡适本人的技术性示范更具转换风气的巨大意义。第二个形式特长是,胡适有意一反古代哲学家们注经解传的传统行文格式,把自己说的话作为书的正文顶格写,而把

引用古人的话——包括圣贤的话和训释性文字用小字低一格附在下面。第一次显示了新时代学者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六经注我”的卓然独立的研究学风。——这一点的革命性意义显然是不可低估的。此外书中在阐述名学逻辑专门名词时大都附注了英文，——以求科学范畴内中西知识上的沟通与认同，篇章末列“参考书举要”，指点读者进一步求知的途径，启发通阅原书的兴趣。有的还专门附一条参考意见，如第八篇《别墨》第三章《论辩》章末除了开列“参考书举要”之外还附一条“此外读者须先读一两种名学书”的意见，显然有助于读者对论旨的更进一步理解。

由于《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思想史上巨大的开创性意义与内容形式的诸多特长，它的问世引起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震惊，出现了空前的轰动性效应，一时人人争读，洛阳纸贵，两个月后即再版，两年多后已出到七版，当时北京大学内的莘莘学子几乎人手一册。即便如四川这样的内地都出现“购者争先，瞬息即罄”的现象。^①胡适在《再版自序》中激动地说：“一部哲学的书，在这个时代，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这是我自己不曾梦想到的事。这种出乎意外的欢迎，使我心里欢喜感谢自不消说得。”——如果胡适仅仅以倡导白话文而轰动一时，他的影响只能停留在一个通俗文化的领域内，当时能看到白话文作为“工具”革命的深远影响的人毕竟不多，正统的学术文化界不可能承认他的学术贡献与学问地位。打个比喻，如果说在白话文运动中出足风头的胡适好比是成功地唱红——红得发紫的流行歌星的话，那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便是登台指挥贝多芬、莫扎特了，而他的指挥竟又一举成功，满堂

① 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的老同学熊克武从四川写给他的信中说：“先生以英挺之资，锐无前之志，少耽文学，名越同侪。近自美洲归来，学益大进，精研哲理，焕发新思。《新青年》杂志及大著《中国上古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大纲》）来川，购者争先，瞬息即罄。谈者谓《哲学史》一书，为中国哲学辟一新纪元。”（《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